

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书系

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

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中文著述

1583-1949

李炽昌 主编

李天纲 孙尚扬 副主编

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入、传播和发展，学术界主要关注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足迹及其不断经历的身份。这一研究路径受到两个局限：一是中国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中研究，二是将西方传教士人的宗教文化观念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基督教，这必然产生了对基督教、非

此之外，学术界也有关注基督教知识分子的宗教认同。

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世界文化和宗教史”的讨论极为重要，但通常讨论是站在这种文化背景出发，一种外在的文化和宗教史观。然而，本世纪初，有学者对此既有完全提出挑战，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认为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中，有待基督教史学、本土的传教士文化史观、中国基督教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书系

D979.2
L130

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

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中文著述
1583-1949

李炽昌 主编

李天纲 孙尚扬 副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中文著述:1583~1949/李炽昌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

(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书系)

ISBN 7-5325-4069-3

I.文... II.李... III.①基督徒—研究—中国—1583~1949②知识分子—研究—中国—1583~1949
IV.①B979.2②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4158 号

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书系

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

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中文著述(1583~1949)

李炽昌 主编

李天纲 孙尚扬 副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73,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50

ISBN 7-5325-4069-3

B·419 定价: 3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言

自从利玛窦于 1583 年到达广东肇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已逾 400 年。对于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入、流播和发展,以往的研究主要是考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他们所撰写的著作,这一研究进路反映了两个倾向:一是重视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二是习惯使用西方人的宗教文化观念看待中国处境下的基督教,这必然产生很多问题。其中一个较为严重的后果即是:基督教一直被视为一个“西方的、外国的宗教”,而不是像佛教那样成为中国宗教传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这样的性质判定和研究进路,本书研究者以为并不妥当。尽管我们承认外国教会曾经一手掌管着中国基督徒团体的事务,然而本书的研究将表明:中国基督徒在构建中国基督教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是由于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局限,这种作用长久以来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

如前所述,大多数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因而往往容易把目光聚焦于评价、分析传教事业的成败上。除此之外,即使是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引入“中西文化相互影响交流”的定位模式的重要性,但通常也只是认为这种交流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的物质或哲学思想上的互换。本书的研究者将以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为突破口,对这些既有观念提出挑战。我们认为,在关于中国基督教的研究中,面临双重身份的中国基督徒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努力应该受到特别重视。因此,

本书将展示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即从中国基督徒自身的文本入手,看待基督教遭遇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与文化之后面临的整合和挑战。

尽管有关本土基督徒活动的研究已不在少数,但以他们作为中国基督徒的双重身份所写下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却尚付阙如。事实上,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员,在皈依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所谓“洋教”之后,由于中西两种文化传统在诸多层面上的差异与冲突,他们必然面临着身份问题的困扰:如何同时既是中国人,又是基督徒。而这种困扰在很多中国基督徒,尤其是来自士人阶层的基督徒那里,是通过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跨文本”的“写作实践”与“身份确定”的过程得以解决(或期望得以解决)的。作为既受本土宗教文化典籍浸染和滋养,又接纳《圣经》文本的新信仰的皈依者,他们基本上都同时认信自幼哺育了他们的本土宗教文化文本以及新接受的基督教文本。因此,试图在这两类文本间实现“沟通”,通过文字的重构与文本实践来重新协调中国典籍与基督教文本,力求使二者合而为一,就成为他们最当然、最便捷的走出其双重身份之困境的途径。鉴于此,本书的研究重点将集中于17至20世纪中国几位不甚知名但却颇具影响力,且一直没有为研究者所充分重视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作品,他们是李天经、韩霖、张庚、严谟、张星曜、马相伯、王治心、赵紫宸、吴雷川、韦卓民等以中文著作传世的有文化的基督徒。尽管这些人在各自所属教派、时代乃至地域方面多有差异,然而他们以“跨文本”的“写作实践”来达到“身份确证”、走出身份问题困扰的经历却颇有共通之处。本书的研究重在阐述他们文本的来源、形成、构造、流播和作用等问题,并具体关注两个向度的问题:一,他们如何占用和引证中国的经典(Chinese Classics),在其著作中诠释基督教的思想;二,他们又如何在其文献表述中吸纳和整合进基督教/西方的因素。“文本化”和“身份”乃是本研究的主要关键词。同时,对这些中国基督徒文本的研究将使我们确信:西方的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后,也面临着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

境遇下,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神学”(Chinese Christianity)得以形成。

本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在基督教文本,即《圣经》,与中国文化文本之间做跨文本的阅读。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是用哲学的、历史的和语言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基督教。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人非常详细地从文本实践和《圣经》解释的角度做过此项研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方面)。因此,本书除了兼用哲学的和历史的方法之外,还将尝试在很大程度上运用文本和《圣经》解释方法,即“跨文本”解释学。运用这一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两种或多种原本彼此独立的宗教—文化文本是如何相互适应融合的。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研究者理解信仰者为了表达自己的双重身份而在自己的写作中让两种宗教—文化文本传统走到一起、直至合而为一的过程。通过对信徒文本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内心的自我定位。我们着重分析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怎样运用中国的经典来解释基督教信仰,以及如何将基督教—西方的因素糅合到文本表达之中。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那种既是中国人又是基督徒的双重身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写作、演讲、思想、观念和信仰都紧紧联系于中国传统文化文本,深陷于这一文化处境之中。我们相信,深入理解这些中国信徒“文本实践”与“身份构建”的复杂的双向过程将会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基督教文本被介绍到中国来时,它就已经开始了被跨文化读解的过程。“外来的”文本挑战并启发了对本土文本的理解,同时后者也反过来为前者提供养分,将之改造成一种新的中国—基督教的混合文本。这样的一个解释系统是富有创造性的,它导致了新的文化模式和文本样式的形成。

通过在有关中国基督教的研究领域运用“跨文本方法”,我们期待着为中国基督教研究打开一个新的领域。首先,它可以使我们避免陷入有关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其次,它可以

使我们更全面地审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细节和空白地带,以便做更深入的研究。再次,它强调了文本的重要性,主张以文本为中心,将哲学、神学、历史和语言问题共冶一炉进行研究,以便理解相当复杂的中国基督教现象。我们需要更为广泛深入地关注传教士们在中国以本土化为代价推进福音传播的传教策略及其传教活动,同时也应关注中国本土人士对这种文化融合的反应。另外本书所涵盖的中国基督徒作品也会对 17—18 世纪到 19—20 世纪之间天主教与基督教传统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些补充材料。

在中国基督教历史领域从事中西比较研究,其实还不止是“跨文本”,它还是“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综合性研究。这样大幅度的跨领域研究,对研究者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也必须是“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界”地组建研究队伍。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系李炽昌教授提出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和方案之后,先期联络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李天纲教授和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孙尚扬教授,还有李炽昌教授的博士生李凌翰参与讨论,李炽昌教授主持课题组。项目提出后,有幸得到香港科学研究资助局的资助,得以立项。此后,香港、内地、台湾和海外的学者朋友给予大力支持,以评论、讨论、参与会议和提供论文等各种形式参与本项目的研究,使得这个难度较大的研究得以顺利完成。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系的许理和教授,是最为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也是当代欧美最重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学者。他很早就提出研究中国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都要重视中国本土的基层资料和文献,重视中国人的本来身份。他为本项目提供的论文,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基督宗教研究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和正确进路。没有直接参加论文写作的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钟鸣旦教授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

台湾大学历史系古伟瀛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黄一农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系吴梓明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冯锦荣教

授、清华大学哲学系王晓朝教授、浙江大学哲学系何俊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张晓林教授等人,都是长期从事中国基督教研究,在历史学、神学、哲学和宗教学方面深有造诣的学者。这次他们应邀参与研究,贡献出他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编者为有学者之间这样的精诚合作感到高兴,在本项目结束之际对所有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编辑与出版,多赖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童力军、秦志华诸先生的不懈努力,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最后,还要感谢香港研究资助局(Hong Kong Research Grants Council)对本项目的拨款资助。

李炽昌

2005年7月

目 录

序言	李炽昌 1
跨文化想象:耶稣会士与中国	许理和 1
跨文本阅读策略:明末清初中国基督徒著作研究	李炽昌 16
明末清初基督教文献中的“是” ——例证与分析	王晓朝 37
从韩霖《铎书》试探明末天主教在山西的发展	黄一农 56
反思与建构:儒者基督徒韩霖融会中西的伦理思想	孙尚扬 99
《铎书》书史:明代版本、各地收藏与现代重刊	李凌翰 141
严谟的困惑:18世纪儒家天主教徒的认同危机	李天纲 156
从儒家经典到天主教教义 ——解析严谟《帝天考》如何为“上帝”正名	褚良才 杨 柳 183
李天经及其《崇祯历书历引》	冯锦荣 202
儒家经典的天学诠释 ——张赓及其《天学证符》	张晓林 227
《辟略说条驳》的言说风格与身份意识	何 俊 243

既依天为归向,莫我知兮又何疑

——马相伯的活力之源 古伟瀛 260

王治心的本色基督教

——一个本土处境的宗教身份表达 何庆昌 276

解读韦卓民博士之《让基督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生根》

..... 吴梓明 298

中国现代的基督徒是如何读《圣经》的?

——以吴雷川与赵紫宸处理《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例

..... 梁 慧 311

跨文化想象：耶稣会士与中国*

□许理和(Erik Zürcher)(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系)

向自西来，涉海八万里，修途所经，无虑数百国，若行荆棘中。比至中华，获瞻仁义礼乐声明文物之盛，如复拨云雾见青天焉。^①

这当然不是我自己的话语——它们并没有道出我初次来中国的真实感受。这些话是400年前一位名人讲过的：他就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 Matteo Ricci，中国人习惯称之为利玛窦。他以创建天主教（确切地说是耶稣会）中国教区而闻名于世。作为学者，他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欧洲科学的入门知识，包括地理学、数学以及天文学。我在开头引用的那段话由另一位卓越的人物记述，他就是著名的儒家学者徐光启。徐光启是朝廷的高级官员，也是晚明影响最大的基督教皈依者。大约在1605年，二人于北京时，利玛窦向徐光启讲述了这番话。那次会晤代表了我今天谈话的主题：一位中国学者和一位西方学者在“文化对等”这样的共同信念下，在彼此欣赏和好奇的气氛中展开了一场对话。不过，你们会看到我谈话的主题不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私人间的交谈，而是两种文化意象或代表以及它们交互作用的方式之间的对话。

* 本文为作者于2004年10月应本课题组之邀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访问期间的演讲稿。

① 原文见徐光启《跋〈二十五言〉》，《徐光启集》上册，页87。

首先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故事经常被人提及,在此就不赘述。但为了后面的叙述之便,请允许我先向大家简单介绍当时的历史背景。

从中国方面看,16世纪末叶和17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值大明帝国统治的晚期。在较早的教科书里,那个时期通常被描述为政局动荡,国势衰微,具体表现在皇帝无能,宦官专权,派系倾轧,财政亏空。这些描述没有错误,但是它过分关注金字塔统治顶端的情况,也就是说强调朝廷与中央政府。中国历史往往很少触及国家和社会的下层统治情况。其实封建官僚体制的庞大机构仍然在中下层发挥作用,地方行政官员和文职人员例行公事:课税、审理案件、维持社会秩序。总的来说,当时的社会局面不是混乱无序,而是出奇的安定。在其他一些方面,明朝晚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城市文明随着大城市的出现而不断繁荣;富商巨贾生活奢侈,讲究排场;教育机构的生源多过以往任何时候,哲学和文学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书籍的印量和销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就是耶稣会士来华时中国的景象。

从西方的角度,主角当然是天主教耶稣会(在华耶稣会)的神职人员,一般所谓的“耶稣会士”。耶稣会筹建于1540年,从一开始就以崭新的“现代”模式不同于从中世纪教会传承下来的早期修会。耶稣会士谨守着贞洁、神贫、听命这三样戒律,生活上遵从耶稣会制定的规章制度。但是在其他方面,耶稣会士享有高度的自由,他们不必居住在修道院里,因此也就不用履行普通修士参加礼拜仪式的义务。他们无需穿著和佩戴任何宗教服饰。在其外表和生活方式上,他们能够很好地适应环境。

除了有这种灵活自主权之外,耶稣会另外一项杰出的特征就是重视教育和学术研究。创建该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应对新教迅速崛起的势头,而其达到这一目的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教育。无论耶稣会士到哪儿,他们都兴建学校、学院甚至大学,教师统一由耶稣会

的成员担任。而在耶稣会内部,事关其成员的智力培养,强调的重点则在学习。规定所有耶稣会士必修的标准课程可能是欧洲最艰深的课程,会士们需要花费经年的努力才能完成学业,课程涵盖修辞学(多少接近当今的“文学”,或“人文学”)、物理学、哲学、形而上学以及神学,还有数学或者天文学这样的附加科目。而且作为现代修会的成员,耶稣会士完全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遗产,他们把大量精力放在了研究希腊和罗马的作者上,尤其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比如柏拉图、塞内卡和西塞罗。当然他们的著作不是基督教课本——它们源自异教的古代。不过在耶稣会士看来,它们蕴涵了崇高的思想和道德准则,它们可以被给予一个基督教的解释。因此,异教的哲学可以选择性地加以运用,并吸纳进基督教的世界观中。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意味着耶稣会士在来华之前就已经对非基督教的思想家持开放态度了。他们在欧洲如何对待柏拉图和塞内卡,他们在中国就会以相同的方式对待孔子。

关于耶稣会士的社会背景:在理论上,耶稣会士对任何能够在修士见习期抵御住严格考验的男信徒敞开大门,但在实际操作中,耶稣会成为精英云集的地方。它从城市里选拔富裕家庭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中的精英,有时候也从身份较低的贵族里挑选成员。这一举措也有重大意义: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能够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在讲究人情世故的城市环境里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

正如前面所说,耶稣会具有一种强烈的传教野心。由设在罗马的总部所指挥的是个高度集权的组织,与其本性相符的是,耶稣会士能够申请被派遣到世界各地传讲福音。在当时的处境下,这意味着他们遵循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外扩张的路线,在美洲被征服地区建立传教据点,也在沿非洲海岸、波斯湾、印度、马六甲,最后到达中国的小片葡萄牙定居点建立教区。葡萄牙人在南中国海岸的定居达到了葡萄牙这个海上帝国向外扩张的极限。众所周知,这个定居点就是1553年攫取的毗邻珠江的澳门半岛。耶稣会士紧随其后,他们不久

就在澳门建立了一所学院和一座会馆,澳门就变成了他们在东亚传教的中心。耶稣会士的处境非常有利于他们传教,因为他们的传教活动受到葡萄牙王室的特别保护,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能够垄断中国的传教工作。

然而,在中国传教仍有待实现,来自各方的阻力有时也会令人生畏。尤其在海上,明朝政府严厉奉行海禁政策。除了官方使节偶尔被获准到北京做短暂访问,其他外国人一律不得进入中国,更不要说为了传播外国教义自此定居了。几十年来,在澳门的耶稣会士集中精力对日本传教,并取得了胜利。但是在中国这边,他们只好等待时机,同时屡次企图进入海防严密的帝国。数次努力未果之后,他们最终成功了:1583年,利玛窦和另外一位意大利耶稣会士在明政府官员中间打通了关系,得以进入广东省,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型传教据点。多年来在澳门的准备活动也没有白费,这使他们有充裕的时间搜集有关中国的信息,学习语言,安排部署。例如,他们获悉在皇帝的绝对权威下,中国由一群信奉儒家思想的士大夫统治着。他们不久就意识到只有联合这些精英人物,他们的传教活动才可能成功。

利玛窦与其同伴从事的这项绝无仅有的试验可以概括为“适应”(accommodation)策略,也就是说,最大限度地顺应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穿着儒服,接受当时的社会习俗;给士大夫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他们介绍的崭新的西方知识,而且是对汉语的精通和谙熟儒学经典著作——总之,他们以“西儒”自居,某些文人学士果真皈依了基督教(总是占很小部分);大多数人很感兴趣,并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或者纯粹出于好奇;还有一些士大夫关注此事,是因为他们反对基督教,认为它是野蛮的宗教,而且其教义有颠覆作用。尽管遭到反对,有时还受到迫害,但是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也算成功。在17世纪,耶稣会发展成中国的一个小型宗教,几乎在每个省份都有其教会和用于传教的屋舍。尽管从数量上看它在当时处于绝对的边缘地位,但是这并不能减损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

的重要性。毕竟它是欧洲和中国高级别智力层面的首次对话。

关于历史背景就谈到此处。现在我要着重讨论一个特别的方面,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早期耶稣会士认识中国的途径;耶稣会士对中国人介绍欧洲的方法,以及中国皈依基督教的士大夫对欧洲意象响应的方式。让我们回到开头,也就是利玛窦对徐光启说的那番话。为了让大家能够迅速回忆起它们,我在此简明表述如下:“我游遍半个世界,每到一处都痛苦不已。但是当我来到中国,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阳光再次明媚起来。”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此次愉快的经历归因于中国奉行的崇高的道德原则(仁义),彬彬有礼的社会习俗(礼乐),其拥有圣明的思想(enlightened ideas),以及独特的文明。他本可以再加一句:“在这里就像在欧洲一样;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利玛窦的基本思想是,欧洲和中国是野蛮人海洋里两座拥有高度文明的岛屿;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对等”的思想。根据两名耶稣会士用中文写的小册子,这一思想也可以表述为,文明世界的伙伴关系使中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更好地与基督教相匹配。例如,只有在欧洲和中国,人们才能发现大量印刷书籍;其他地方的书本,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也不过是结绳记事或者在竹叶上的涂鸦而已。

然而当耶稣会士在中文书写的小册子里作如是评价时,我们必须谨慎地加以对待。他们面向中国学者和官员说这番话,不排除奉承拍马的因素。这些话果真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想法?或者这些话只是机会主义的产物,抑或单纯出于礼貌?

所幸的是我们可以返回到西方文献中去检验它的可信程度:西方至今保留着耶稣会士的信件、笔记以及描写中国的文字——这些材料由多种欧洲文字书写,当时的中国人是绝对不可能接触到这些材料的。文献里有许多段落是在赞美中国。由此确信对早先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与其他非西方世界的地区相比,中国的确有品质上与众不同的地方。请允许我随意引用其中一段类似利玛窦的话;它是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在中国度过了25个春

秋后于 1668 年写下来的：

中国是如此疆土辽阔，物产丰富，百姓和善，人口众多；中国人在艺术上的造诣和统治的技巧如此出类拔萃，自第一次航行以来我在沿途从未发现像中国这样的地方。

类似这样的文字大量存在。一般都是在感叹中国的优秀和独一无二。经常有耶稣会的作者将中国和西欧做比较，这些比较往往停留在基本物产和人种特征上。耶稣会士认为东亚人不像新大陆上的黑人和其他肤色较深的居民，他们是“和我们这些欧洲人一样的白人”。他们和非洲以及美洲部落里的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对于前者，欧洲人会不假思索地认为那是野蛮人。他们也和那些无知无识、反映迟钝的印度人不同。甚至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利玛窦评论道：中国人和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习惯方面也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吃东西不用手抓，有椅子坐，像我们一样有床睡，我们的许多艺术和技术中国也有，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就是印刷术。

在物质文明的领域里，中国的大城市给传教士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不只是由于中国城市的规模庞大，商业和运输业异常繁荣，而且在于中国城市整饬有序的布局，这些规划安排经过几何设计，表现于石子铺过的路面，宽阔笔直的街道。从跨文化的视角，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会士对中国怀有浓厚兴趣的理由了。16 世纪的欧洲，特别是意大利，见证了文艺复兴城市建设的第一股浪潮。当时的诸侯、教皇和红衣主教竞相修建宽阔的街道，宏伟的广场和街心花园，用以装点他们的城市。对一个 16 世纪的欧洲观察者来说，当时中国的大都市决不是 19 世纪西方人形容的样子——东方落后的象征——相反，对先前的耶稣会士来说，这些城市相当现代！举一个例子就足够说明这一点，利玛窦到达南京后不久，在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这样记述：

南京是整个东方最出色的城市；甚至我敢说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很难超过她，南京城内公私建筑都富丽高贵，城墙坚固雄

伟，住宅区繁华宽敞，市民天才横溢且富于美德。

耶稣会士对中国物质文明的极高赞誉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不止有闻名远近的丝绸和瓷器、漆器这样的奢侈品，还有桥梁建筑、交通以及依山而建的梯田。这些物质文明充分证明了中国人的天才横溢或“心灵手巧”(ingenuity)——而“心灵手巧”(ingegno)作为文艺复兴的核心观念，再次成为文化对等的内在思想。

耶稣会士的某些评论也许会让 21 世纪的读者大吃一惊，但是从 16 世纪欧洲人的观念来看，这些评论也许是比较实在的。例如，中国的监狱据说比欧洲人的监狱舒适得多，甚至死刑都是比较人道的。百姓的识字率出奇地高，尤其是在南方省份。在中国，只有极少数人非常富有或者极端贫困；财富和贫穷在中国要比欧洲分配得均匀。尽管 19 世纪西方观察者给我们讲述了与此相反的情况——但是依据当时欧洲人的准则，这样的陈述还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这一切都构成了耶稣会士的中国意象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直接感知的层面”。我们由此知道耶稣会士如何感受和评价他们眼里的中国。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记录和评价都是正面的，他们也注意到一些消极负面的东西，比如官场的营私舞弊，百姓不得不缴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有大量迷信活动等。不过总的来说该图景是颇受赞许的。耶稣会士反复比较的对象是当时的欧洲，通常中国在他们看来至少等同于西方。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坚持了文化对等的观念。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第二个层面，它包括耶稣会士对中国道德和社会生活的评价，这样我们就进入到比较抽象的价值和理想维度（很明显，传教士的主要精力放在了 this 层次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评论基于实际的观察。于是他们注意到中国人对建立武功不感兴趣，军人，甚至武官的地位不受尊崇。然而如果作者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出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反对暴力和杀戮的慈悲心理，中国从来没有征服过任何邻邦，“就像我们欧洲国家一贯的作为那样”，很明显，